



镇江梦溪园

□李学朴

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其严谨而巧妙的布局，精湛而高超的技艺，山明水秀的风景，鸟语花香的境界，诗情画意的精髓，让“鸢飞戾天者‘游园’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景’忘返”。

古典园林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于商、周时代。史料记载商汤王“居于苑囿，不辍视事”；周成王姬诵“驻桐馆瑶台而理天下”；秦庄公“每出猎必驻馆宴赐”（见顾颉刚《古史辩》卷144），足见古代帝王于苑囿中憩养享乐，同时理政视事。

中国古典园林营造的历史足迹，从其营建立意、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看，先后经历四个发展时期：首先是商周至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园林营造，以辟划、利用自然山水为特点，建筑物较少，更缺乏人文景观的构设，其中放养食草野牲、禽鸟，供观赏和射猎。因此，园林属性以囿的成分居多，表现为自然主义的造园手法。

史载，殷商时代著名的御园“沙丘囿”，或称“沙丘苑”，便是自然主义造园的典型代表。位于邢州平乡东北20里（今河北省广宗县境）。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沙丘囿南界朝歌，北至邯郸，皆为离官别馆。到商纣王时期，园内“益收狗、马奇物，充轫官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春秋战国时代，沙丘囿仍被赵国袭用，甚至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驾崩于沙丘平台”。

另外，周成王时的“镐池”、周文王时的“灵囿”，都是凭借自然山地、水流，营造馆舍于其间，创造出可供娱情愉目的自然主义生活空间。

其次是秦、汉至三国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65年），是写实主义造园时期。这一时期的造园立意，着意于模仿自然。造园者已从简单地利用自然，发展为利用并改造自然。不过仍带有前一时代的痕迹，造园以自然为蓝本，追求广大。诸如上林苑、梁园、影娥池、昆明池、太液池、昭祥苑、御宿苑、灌龙园、毕圭灵昆苑，三国时代的铜雀台、芳林苑，都是以自然之野，营造广大为特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大建官室，从而在“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种带有官室的园林形式——苑，又称官苑。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造上林苑，苑中建造许多离宫，供游乐之用。还在咸阳“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三秦记》），开创了人工堆山的纪录。到西汉时，汉武帝刘彻大建苑圃，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建成后的上林苑规模宏伟，官室众多，且有许多游乐内容。上林苑地跨长安（今西安）、咸宁、鄠（今周至）、鄠县（今户县）、蓝田五县境，纵横300里，几乎囊括了京城长安以南、西南面的广大地域。

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可见仍保持着射猎游乐的传统，但主要内容已是官室建筑的园池。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36苑、12宫、35观。如建章宫、宣曲宫、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观象观、白鹿观、葡萄宫、扶荔宫、承光宫、储元宫等。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大一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20公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

古时一些和帝王相关的苑囿、花园，其文化意味和背景对赏景观园的帮助就更大了。如临潼骊山，除了久享盛名的关中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以及千载长流的骊山温泉和留存至今历代重修的殿廷楼阁、池沼林木之外，还沉积着无数的沧桑传闻。游人在这里看到烽火台的遗址，就会追想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留存至今的江南园林，有不少园主人是当时的文坛名士，有的是由著名诗人、画家帮助布局设计，其本身就带有着较重的文化色彩。

如梦溪园，纪念的是北宋著名学者沈括。

沈括是一位文人，亦做过官，学问极为渊博，“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随着历史变迁，这些著述大多亡佚，唯晚年于园中所写《梦溪笔谈》传世，尤为人们所推崇。花园临街汉白玉门额上镌刻的“梦溪园”三字，是当代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手笔。迈进入园，中堂挂有沈括穿官服的正面画像。两副对联是书法家萧娴所撰并写的“一代司天监，千秋说梦溪”。步入后院，山石玲珑、新篁挺秀、林木拥翠。拾级而上，便是沈括纪念大厅。厅前一条小溪，是按当年《园记》所述：“水出峡中，渟杳缭环地之一偏者”的格局设置的，此即著名的梦溪。

说到“梦溪”两字，沈括在《梦溪自记》中还有一段情深意长的叙述。原来他30岁左右时曾经几次做梦，梦到到一地游历，有一座小山，山上开满鲜花，如同覆盖着一片云锦，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山下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使他十分快乐。十几年后，沈括谪守宣城，有位道人向他谈起京口（即镇江）山水秀丽，正好邑人有所旧园要出售，沈括听了心动，便给道人30万钱买下了这座花园。后来，沈括因罪被废，到处游历，经过镇江时，到所购园中一看，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十分惊讶，叹道：“吾缘在是矣”。于是举家迁镇江，题名为“梦溪”。梦溪园景色虽简，意味却很深浓。这座古园在文化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园林要在较小的范围内收尽自然山林的美景，做到“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也常常应用艺术的象征或隐喻的手法，赋有限的风景形象以无限的意味，使一般的园林景物具有更高的观赏价值。比如扬州个园，不仅以竹闻名，它的四季假山在国内园林中也是独具一格的。在现实世界中，四季不能同现，四季山的造景本身就包含着“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的意味。一年之中春最早，春山就在园山入口处。这是一组山石花台造景：但见台上修竹丛植，竹间点着几株石笋，以雨后春笋的比拟启发游人“春来”的联想。竹林后为漏窗粉墙，竹石光影投射于墙上，日走影移，颇具春日山林之趣。

如果说山石是园林的骨骼，那么水、泉则是园林的血脉。在园林建造过程中，疏水引泉同样重要。自秦皇汉武引水为池以来，历代园林无不重视水体在园林中的建设。因为水势富于变化，兼具动静抑扬之美。正如《淮南子·本经训》说的：“凿汙地之深，肆畛崖之远。来溪谷之流，饰曲岸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砌。抑瀼怒瀨，以扬激波。”比如张伦宅园虽以山石为主，但也注意“深溪洞壑”对山石的衬托。

隋炀帝营建洛阳西苑，尤重园中泉水。《隋书·食货志》载：“（炀帝）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宋人刘斧在《隋炀帝海山记》中说，西苑“内为十六院，聚土为山，凿为五湖四海……每湖方四十里……湖中积土为山，构亭殿，广袤数千间，又凿北海间环四十里，中有三山，设蓬莱、方丈、瀛洲，上皆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狭湖，五湖、北海，俱通行龙凤舸，帝多泛东湖”（《青琐高议·后集卷五》）。水景与山体、建筑的配搭如此巧妙，这一切都表明水体在园林审美中具备了组织庞大园林空间和无数自然、建筑景物的艺术功用。

古园中的水是园景生动的点睛之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这是刻在济南趵突泉泺源堂柱上的一副楹联，为元书画家赵孟頫的咏泉名句，写出了这一名泉形和声的美。每逢秋末冬初，由于趵突泉水温高于周围的温度，水面上凝浮着一层水汽，犹如烟霞缭绕，加上泉声涛涛，给这一动人景色更增添了魅力。

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造园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它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在今天，中国的园林文化也没有随着历史逐渐风化，而是保留了传统园林文化精神内核，跟随着现代审美与当代文化不断生长，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中式园林道路。

【文化观】

## 当他们面临生死之际

□丰家雷

汉代的李陵与明朝的张辅两位历史人物身不由己的“生死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

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李广利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关，哪知道这个外戚李广利一遇到敌人就溃败，全然不顾李陵的几千步兵，丢下大军逃之夭夭。迫不得已，李陵率孤军深入浚稽山，遭遇匈奴8万骑兵的围攻。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李陵斩杀敌军1万多人，终因主力部队后援迟迟未到，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终全军覆没，李陵本人不幸被俘，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回京城后，朝廷大为震惊，汉武帝勃然大怒，当即把李陵全家老小关入死牢。当时，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义愤填膺，纷纷义正辞严指责李陵。唯有太史令司马迁为之辩解，替他说了些好话。结果惹恼了皇帝，盛怒之下，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定了死罪。后因无钱保释免罪，不得已，只得被处以宫刑。在汉武帝看来，太史令的辩解多少有点“不识好歹”——既然抓不到李陵，正找不到地方撒气的皇帝，迁怒于司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

设想一下，如果李陵真的以身殉国了，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不难想象，极好面子的汉武帝一定会将李陵树为先进典型，弘扬其先进事迹，也可能会为李陵立碑撰颂、筑庙烧香，供后人瞻仰，甚至还会为李陵封侯，其家族加官晋爵，受到褒奖，世代恩宠。可是，李陵不但没有战死，竟然还投降了。历史的荒诞，让李广一家的名将神话变成了笑话。这一事件连累司马迁差点被杀头。如果他不能“隐忍苟活”，哪里还会有这流传千古的《史记》呢？

张辅的经历恰恰相反，为了名节他只能被迫“舍生”。

张辅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河南开封人，出身世家，是靖难之役第一功臣张玉之子，明朝初年的重臣、名将。其人不苟言笑，治军严明，极善统兵。早年间随父参加靖难之役，累封新城侯。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张辅随明英宗北征瓦刺，英宗率50万军队御驾亲征，结果大败于蒙古兵，大明皇帝被活捉，史称“土木堡之变”。正史记载，张辅在这场战役中效命沙场，以身殉国。

但在查继佐的《罪惟录·张玉传》中，却有着这样的记录：“辅败逃还，知不可生，自缢死，家人以阵亡闻。”也就是说，久经沙场的张辅其实并未阵亡，而是在贴身侍卫的保护下，趁乱易装逃离前线，几经辗转，潜回京城，隐匿家中。

这段史料，为我们刻画出历史的另一种吊诡。明英宗战败被俘，举国震惊。一代名臣于谦率众保卫北京，支持景泰帝监国，保住大明社稷。对战争中的将士论功行赏，褒奖安抚，追封“壮烈殉国”的张辅为“定兴郡王”，并上溢号“忠烈”。

张辅看到自己“身后”的极尽哀荣，身心疲惫。在冰火两重天中交替挣扎着、折磨着、煎熬着。回想自己一生，也是南征北战、东伐西剿，屡经战争洗礼，被誉为明朝军队的定海神针。此时，一旦真相败露，自己一生荣耀尽失，朝廷也将严查重罚，恐怕还会连累整个家族。现在自己已官居显爵，声名远扬，且已七十高龄，无论是为自己的名节，还是为家族的利益，综合考量，摆在他面前的，自行了断无疑是唯一且最好的选择。活下去成了最难堪的迈不过去的坎。英雄末路，心如死灰，年逾古稀，只欠一死。

终明一朝，张辅家族的英国公爵位世袭罔替，与明朝相伴始终，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英国公张世泽，在1644年为抵抗李自成率军血战，攻破北京时被杀，这个时候距离张辅之死已近20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家坐享这近200年的金玉满堂、钟鸣鼎食，就是靠张辅的老命换来的。

封建社会的君王拥有绝对权力，皇帝金口玉言，个人的生与死，完全要看皇帝的需要，便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七十多岁的张老将军从前线死人堆里爬回家，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朝廷，已对外诏告张辅“壮烈殉国”了。既然皇帝的话不能改，那就只能改他的命运了。朝廷需要他“壮烈”，那他必须“壮烈”，张老将军就不得不以死来维护皇家的颜面。好在，皇家也没有白要张辅的命，还给予了丰厚的回报。

总之，他的自我了断，就成了“一了百了，一好百好”的最佳“剧本”。对于整个家族乃至社会而言，这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效果最好的“好死”。史家也省去了很多麻烦，正史写起来就很容易光明正大了。

反观李陵，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朝廷需要他死的时候，他选择了生，尽管赖在人世上又苟活了二十多年，但不难想象，他活得很难堪，甚至生不如死。当然，李陵内心的煎熬苦楚恐怕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到了汉昭帝的时候，主政的大臣霍光曾派遣使者招他回来，他最终也没有踏进中原故土一步，这也可能是无颜见汉家父老了吧。

历史上好多“好死”与“赖活”的尴尬变奏，犹如一对冤家，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作为当事人李陵与张辅的人生，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五味杂陈，活着反倒成了最尴尬、最无奈的窘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他们个人的悲哀，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